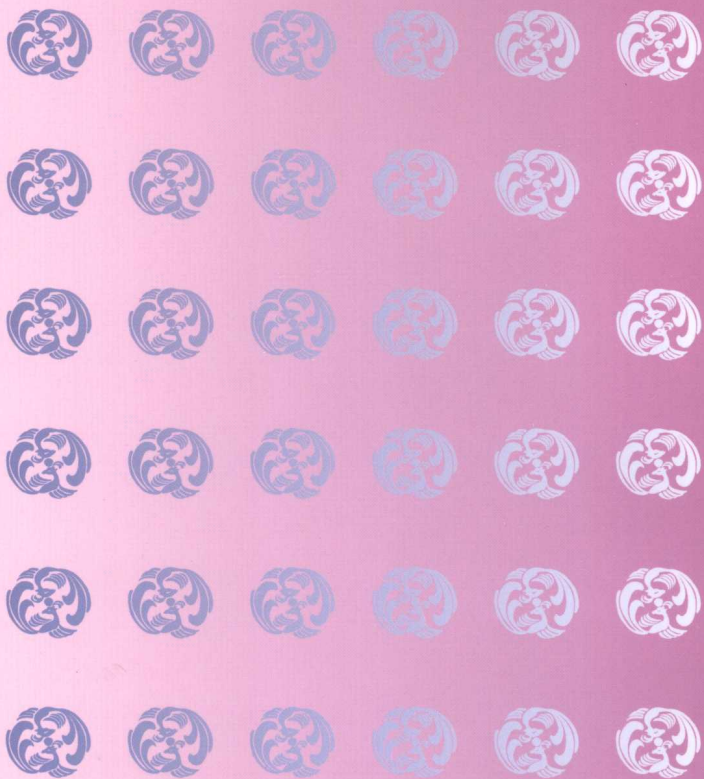


主编 田本相 董 健



中国话剧研究

第十一辑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话剧研究. 第11辑 / 田本相, 董健主编.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 - 7 - 81127 - 123 - 2

I. 中… II. ①田…②董… III. 话剧—研究—中国—丛刊
IV. I207.34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1911 号

中国话剧研究 (第十一辑)

主 编 田本相 董 健

责任编辑 欧丽娜

责任印制 曹 辉

封面制作 九点设计

出版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 100024

电话: 86 - 10 - 65450532 65450528 传真: 65779405

http: //www. cucp. com. 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10.375

版 次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7 - 123 - 2/K · 123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 春柳社百年纪念 ·

- 春柳社在中日戏剧交流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田本相(1)
- 另一种《姊妹花》 [日] 饭塚容(7)
- “文明戏”的样态与话剧的发生
- 兼及对“文明戏体系”说的质疑 袁国兴(22)
- 日本的新派剧、新剧与春柳社 [日] 神山彰(31)
- 论新民、民鸣社 [日] 濑户宏(36)
- 新的演出方法的开始
- 新的“民族形式”的创造与文明戏 [日] 松浦恒雄(50)
- “春柳社友”林天民的新剧活动与剧本创作
- “未刊话剧史料拾零”之一 顾文勋(63)

· 曹禺研究 ·

- 从故事模式看曹禺对剧场性的追求 刘家思(74)
- 曹禺剧作的家族叙事
- 以《雷雨》、《北京人》为例 谷海慧(97)
- 穿越时空的回声
- 曹禺与莎士比亚戏剧比较 叶庄新(106)
- 关于全新解读《雷雨》创新演出文本的阐述 王延松(142)
- 试探曹禺《雷雨》戏剧结构 [日] 濑户宏(150)

· 现当代话剧研究 ·

- 张彭春与南开新剧团 宋宝珍 (158)
- 论林兆华导演艺术的个性与偏执倾向 张 驰 (175)
- 高行健九十年代剧作的语言形式 范 彬 (202)
- 田沁鑫剧作现代性初探 向 阳 (233)
- 萨特与存在主义戏剧 周慧华 (246)

· 戏曲研究 ·

- 齐如山的戏曲起源论与改良论 梁 燕 (259)
- 试论姚水娟和樊迪民的越剧改良运动 [日] 中山文 (274)

· 史料 ·

- 文艺协会会则 (290)

· 剧评 ·

戏里戏外,《立秋》的秋意

——国家舞台精品工程剧目品味 吴 戈 (297)

“大雪”前夕看《立秋》有感 于善禄 (309)

喜剧中的黑色情调

——兼论《秀才与刽子手》的喜剧精神 张 荔 (313)

· 书评 ·

一部新型的规模宏大的话剧史 杨景辉 (322)

后记 (326)

· 春柳社百年纪念 ·

春柳社在中日戏剧交流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田本相

主席先生，朋友们，女士们：

首先让我代表与会的中国学者，向主办单位早稻田大学戏剧博物馆，向促进这一会议的饭塚容先生和濑户宏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

在迎来中国话剧百年纪念的美好时刻，在这新年新春之际，由日本朋友举办这样一次国际研讨会，是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的，它将记载在中日戏剧文化交流史上。

百年前，春柳社在东京成立。它在日本戏剧的直接影响下，在日本戏剧界的朋友的帮助下，先后演出《茶花女》第三幕和《黑奴吁天录》，春柳社的这一活动划开了中国戏剧史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且成为中国话剧史的开端的界碑。

为什么它会成为中国话剧史开端的标志？这在中国戏剧界也是有过争议的。的确，在春柳社之前，上海已经有过西方戏剧的演出，也有过教会学校的学生演剧，以及新剧社团的活动。但是，从中国人第一次看到西方戏剧开始，到西方戏剧逐渐传入中国，直到1907年春柳社在东京演出《茶花女》第三幕和《黑奴吁天录》等剧，在中国话剧的胚胎期中，春柳社作为中国话剧史上第一个有着自己明确章程的新

剧团体，第一次创作并演出了（从剧本到舞台）中国自己的话剧，这的确使它有了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据此，1907年春柳社在东京的演出才被众多话剧史家认定是中国话剧史开端的一个标志。

春柳社之所以成为中国话剧史开端的一个标志，还在于它对中国话剧的诞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春柳社之前，话剧在中国也有所传播，但是，春柳社在东京的演出恰如一声春雷，引来中国话剧的春天。据朱双云《新剧史》记载，春柳社在东京演出的成功，在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各报亦多誉词。嗣是新剧于社会之益，人多知之。伶人之稍具思想者，亦相率规仿以趋时尚，时丹桂之《潘烈士投海》、《惠兴女士》，春仙之《瓜种蓝因》、《武士魂》等，并受欢迎。”于是，“新戏之价值日增，流至今日，而其风始昌”。

号称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个新剧团体，王钟声的春阳社也有人说是在春柳社的影响下成立的。而王钟声演出的《黑奴吁天录》，显然受到春柳社的直接影响。自称是春柳社社员，并看过春柳社在东京演出《黑奴吁天录》的任天知，更是春柳社的仰慕者。王钟声和任天知，他们与春柳社员都曾有过不同程度的合作，无疑，其中渗透着春柳社的影响。

春柳社的影响，还表现在春柳社员陆镜若等回国后在上海成立新剧同志会，以及有关的演剧活动上。先后参加新剧同志会的有马绛士、罗曼士、吴惠仁、蒋镜澄、姚镜明、陆露沙、吴我尊、欧阳予倩、胡恨生、董天涯、董天民、郑鹧鸪、冯叔鸾、管小髭、张冥飞、宋痴萍等。他们志同道合，生活清苦，对新剧艺术的态度十分认真，生活作风也比较严肃。他们延续并发扬了春柳社的演剧作风；无论在演剧作风和艺术创作上都留下深远的影响。

他们重视剧本创作，而且特别重视自编剧本和改编剧本的质量，尽可能使其具有艺术性。新剧评论家马二先生对春柳剧场的剧本创作给予很高评价：“春柳剧本之佳者，当推《家庭恩怨记》、《不如归》、《真假娘舅》为最优等。结构周密，立意新颖，逐幕皆具一种特别精

彩。令人看了第一幕，便想看第二幕，看了第二幕，更不能不看第三幕，步步引人入胜，剧终仍有余味。此其所以为绝作也。”“次则《鸳鸯剑》、《大闹宁国府》、《夏金桂自焚记》、《兰因絮果》、《异母兄弟》、《爱欲海》、《夺嫡奇冤》、《秋海棠》、《陈七奶奶》、《宝石镯》等剧，命意布局皆有独到之处。为每剧皆不免有一二松懈之处，皆赖演剧人为之补救，所谓大纯小疵也。”“又次如《寄生花》、《生别离》、《文明人》、《渔家女》、《运动力》、《浮云》、《玉鱼缘》等剧，或儿女团圆，或讽刺时事，“命意随佳，确知足供人一览无余，不复耐人寻味也”，“至若《茶花女》、《侠女》、《驯悍记》、《陶子尧》、《田小辫子》、《贾大少爷》、《沈剥皮》等剧，不过取材流行之小说，号召观客而已。结构上殊欠精密，每次开演，其佳处仅恃三数艺术优尚至演员博人兴趣耳，非脚本上固有之文章也。”因此，他说：“今之谈新剧者，就艺术上眼光衡之，必以春柳剧场为冠首。此一般评剧家所同认也。”^①

虽然，春柳剧场的演剧没有成为新剧的主流，但是，它确实成为中国话剧的先导和榜样。

因此，当日本朋友在这里举办关于春柳社百年的国际研讨会时，不但让我们重温历史，更深切感受到日本朋友们的深厚情谊。

同时，我认为春柳社的成立及其活动，也成为中日近代戏剧交流史的开启的标志，这点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日本都有着现实和历史的意义。

大家知道，中日两国戏剧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最近，中国学者翁敏华在他的《中日韩戏剧文化因缘研究》一书中，对于中日戏剧文化因缘的研究提出很好的见解。他认为，中日戏剧交流的历史几乎同中日的移民史、战争史、文化交流史是同步的。他特别提到中日韩戏剧呈现出“同根异花”的戏剧文化现象，特别是文化“同根”的看法，是令人深思的。

但是，我们看到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文化始终作为一种强势文

① 马二先生：《春柳剧场观剧评谈》，《游戏杂志》第9期。

化，而日本文化作为一种弱势文化彼此进行交流，中日戏剧文化的交流也是这样。

而春柳社在东京的戏剧活动，却开启了中日戏剧交流的新阶段，展现出新的面貌。它可以说是一次中日戏剧文化水乳交融的交流，中国的留学生，以日本新派剧为师，虚心求教，终于把这样一个中国从未有的西方剧种搬上舞台。这对日本来说，无疑标志着结束其长期弱势文化的地位，而对于中国来说，则标志着结束其优势文化的地位：从闭关自守走向开放，从夜郎自大转向虚心学习。应当说，这样一次戏剧文化交流，开创了一个良性戏剧文化交流的范例，也是中日友好的象征。

春柳社的活动是中国近代文化觉醒的一个鲜亮的信号，是中国人主动选择的结果。毛泽东这样说：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而春柳社人，也是这样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显然，他们是把西方的戏剧作为新的东西而接受的。这是中国人一种主动的文化选择，当时在东京就有上万的留学生，春柳社的社员，作为中国的留学生，学习西方戏剧，成为他们寻求真理的目标。

在中国话剧的诞生期，日本戏剧对中国话剧诞生所起的作用，已如上述。在“五四”时期，正是在日本的留学生，田汉、郭沫若、白薇、杨骚等人，把西方戏剧的信息以及日本戏剧的进展介绍到中国来，同时，他们也成为“五四”新剧的创作主力。当时，鲁迅翻译的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田汉翻译的菊池宽的《父归》，周作人

翻译的山本有三的《婴儿杀害》等，成为文学青年所热爱的剧目。尤为令人注目的是，在“五四”时期出现的现代派的剧作，大多出自留日学生之手，如田汉、郭沫若、陶晶孙、白薇等，他们把在日本感受到的西方现代派戏剧的思潮融入他们的戏剧创作之中。

三十年代，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朋友的推介帮助下在东京演出曹禺的《雷雨》，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而且再一次证明中日戏剧的近亲因缘关系。它成为又一个中日戏剧交流史上的佳话。

我们也看到，为老一辈中日戏剧家所开辟的中日戏剧交流势头，在未来的岁月中几经阻断。在新中国成立后，戏剧交流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但是，我以为中日戏剧交流的空间是十分广阔的，是有着美好的可能的前景的。最近，看到中国人对日本学者加藤彻的《汉文的修养——什么创造了日本文化》一书的介绍，此书主要阐明汉文和日本文化的关系。作者的一些看法，既使我十分敬佩，也引起我的深思。他说：

汉文曾经是东亚的世界语，是日本人教养的大动脉。

重阅古代以来日本历史中的“汉字”、“汉文”，会懂得日本人怎样思考、怎样尝试、怎样构建了这个国家。

在汉文对日本还是切近存在的时代，汉文的力量是怎样被用于政治、外交的？

对于他们，汉文带来了怎样的知性和思考？

——通过重新审视成为日本发展原动力的，成为其文化、政治支撑力量的“汉文的修养”，提示日本文化丰富的可能性。^①

也许加藤彻先生的观点，只是他个人的看法。但是，他的话对于

① [日] 加藤彻：《汉文的修养——什么创造了日本文化》，日本光文社2006年2月版。

我的启示是：中日文化的确有其“根”性的联系，这种带有“根”性的联系，不仅对于“日本文化丰富的可能性”具有动力，对于中国文化丰富的可能性也是同样的。文化的互动交好，是发展各自民族文化的动力。春柳社在东京的成立和活动，就是这样一个历史的见证。

最近，我听到一种说法，有人用“远亲不如近邻”来比喻中日关系。的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日之间不仅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而且我们彼此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尽管人类的历史总免不了被涂抹战争、流血、征服、霸权的遗迹，但是作为一个文化人，我还是真诚地相信，那些以铁和血书写的历史，终究会褪色、腐烂、消失；而不同民族间文化的相互促进与协同发展，才是我们人类永远也写不完、常历常新的历史诗篇。

最后，让我用一首小诗结束我的讲话：

春柳葱茏起扶桑，
绿上中原映晴光。
中日文心本一脉，
云帆风正水天长。

让我们再一次感谢日本朋友！

另一种《姊妹花》

[日] 饭塚容

前 言

此前在论述文明戏作品《姊妹花》被搬上银幕的过程时^①，笔者就曾对担任电影导演及编剧的郑正秋（1889～1935）在文明戏时代的剧团新民社里一次也没有排演过此剧目而产生过疑问。于是，在那篇论文中指出了《姊妹花》作为春柳社的一个剧目曾于1914年公演过的事实。其后，由于又查到了几份相关资料，因此，在此想就春柳剧场版本的《姊妹花》至上演为止的经过以及剧作相关情况再次考察一下。

如果先阐明结论的话，那么可以断言春柳剧场版本的《姊妹花》是由陆镜若从日本带回来的菊池幽芳创作的《乳姊妹》改编成的。再进一步追溯的话，还可以考证出这部作品源于末松谦澄的翻译作品《空谷山丹》，而其原作为伯莎·M·克莱（Bertha M. Clay）的英国小说《多拉·索恩》（*Dora Thorne*）。因此，是否可以说，是一部和其搬上银幕的郑正秋的文明戏作品完全不同的作品，可以说是另一个种类的《姊妹花》吧。

^① [日] 饭塚容：《关于文明戏的电影化》，收录于《现代中国文化的轨迹》，中央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39～72页。

一、伯莎·M. 克莱的《多拉·索恩》

伯莎·M. 克莱是英国女性小说家夏洛特·M. 布莱姆 (Charlotte M. Brame, 1836 ~ 1884) 的笔名。布莱姆是一位擅长创作“以女性为主人公的言情剧风格的家庭小说”^①的作家。她去世以后, 那些小说被介绍到美国, 获得了空前的好评, 瞬息间赢得了无数的读者。为此, 出版社召集了几名作家, 令其模仿布莱姆小说的内容写成各种新的小说, 之后用同一笔名来发表。这些作品于明治时代传到日本, 日本作家黑岩泪香、尾崎红叶、小栗风叶等纷纷以这些小说为蓝本进行了改编创作。

从一开始起, 署名作者为“布莱姆”的出版物中, 就已经包括了布莱姆本人以外的作者所写的作品, 再加上明治时代的文人们在改编的作品后面几乎都没有注明蓝本为哪一部原著, 因此, 这类作品周遭的情况相当复杂, 可以说谜团重重。终于在最近, 堀启子女士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了。^②堀女士明确考证出了《金色夜叉》的蓝本为布莱姆的作品《比女人更软弱的人》(Weaker Than Woman), 并翻译出

① 《英美文学辞典 (第三版)》, 研究社 1985 年 2 月版, 第 242 页。

② 依管见所及, 可列举下列诸篇论文:

- *《尾崎红叶的〈不言不语〉与其原作者 Bertha M. Clay》, 刊载于《文学》季刊第 8 卷第 2 号, 岩波书店 1997 年 4 月版。
- *《黑岩泪香的作品〈白雪公主〉中对万国著作权的意识——围绕伯莎·M. 克莱的原作谈起》, 刊载于《国语与国文学》第 76 卷第 7 号, 东京大学国语国文学会, 1999 年 7 月。
- *《试论〈空谷山丹〉——以伯莎·M. 克莱的原作为蓝本》, 《北里大学一般教育纪要》第 5 号, 2000 年 3 月。
- *《论〈金色夜叉〉的蓝本——围绕伯莎·M. 克莱谈起》, 刊载于《文学》隔月刊第 1 卷第 6 号, 岩波书店, 2000 年 11 月。
- *《黑岩泪香的作品〈肖像〉及其蓝本作家伯莎·M. 克莱》, 刊载于《英语青年》第 146 卷第 11 ~ 12 号, 2001 年 2 ~ 3 月。
- *《黑岩泪香的作品〈小姐的一生〉与伯莎·M. 克莱的作品〈艾琳的誓约〉》, 刊载于《英语青年》第 151 卷第 12 号, 2006 年 3 月。

版了该作品^①

目前在日本,《多拉·索恩》的原著被收藏于实践女子大学图书馆。笔者得到确认的是1900年由纽约的美国新闻公司(The American News Company)出版发行的版本。下面,参照堀女士的论文^②,将这部作品的内容梗概介绍一下:

英国的一个伯爵埃尔(Lord Earle)的儿子罗纳德(Ronald)不顾父母的反对,不顾门第悬殊,毅然与伯爵家的山中小屋守屋人的女儿多拉·索恩(Dora Thorne)结了婚。被伯爵断绝了父子关系的罗纳德作为一名画家和多拉一起开始在意大利生活,并且有了两个女儿。然而,不久,夫妻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多拉对和埃尔家关系亲密的贵族之家的女儿瓦伦丁(Valentine)与丈夫之间的关系产生怀疑,一气之下带着两个女儿回了娘家。为此,深感落魄的罗纳德只身踏上了旅途。两个女儿性格截然相反,姐姐贝阿特丽丝(Beatrice)活泼好动,妹妹莉莲(Lillian)文静内向。厌倦了乡间生活的贝阿特丽丝有一天与船员休(Hugh)邂逅相识,贝阿特丽丝被休所讲述的异国见闻深深地迷住了,于是二人偷偷订了婚。不久,由于伯爵去世,罗纳德回到了伯爵宅邸,并领回了两个女儿。贝阿特丽丝隐瞒了与休之间的恋情,身边又有了新的恋人——艾尔利伯爵(Lord Airlie)。同时,莉莲也和亲戚家的青年莱昂纳尔(Lionel)恋爱了。就在贝阿特丽丝和莉莲即将结婚的时候,休突然来访,要求贝阿特丽丝履行婚约。莉莲为了帮姐姐解围而去与休当面交涉,而目睹了二人会面情景的莱昂纳尔心里却产生

① 伯莎·M. 克莱著,堀启子译:《比女人更软弱的人》,南云堂火凤凰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② 《试论〈空谷山丹〉——以伯莎·M. 克莱的原作为蓝本》,第111页。

了误会。此后直接去找休当面谈判的贝阿特丽丝失足跌进水池溺水身亡。休认为溺水事故的责任全在自己，于是给罗纳·德写了一封信讲明了事实真相，然后负疚自尽。这场灾难也成了罗纳德与多拉和好的契机，夫妻二人破镜重圆；而莉莲也和莱昂纳尔顺利成婚。

据讲，这部描述了英国贵族家庭内部风波的作品“很显然是鼻祖‘伯莎·M. 克莱’即夏洛特·M. 布莱姆自己的作品，并且被视为她的代表作”^①。在其本国英国以及美国，作品一定获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这一点毫无疑问。

二、末松谦澄的《空谷山丹》

末松谦澄（1855～1920）由于受到伊藤博文的赏识而步入了政界，作为一名曾官至邮政部长、内务部长的政治家而声名赫赫。而另一方面，作为一名曾经留学英国的翻译家和评论家，末松谦澄也相当活跃。

《空谷山丹》是从1888年到1890年由金港堂出版的（共4卷）^②，同《源氏物语》的英文译著和英国诗歌的汉文译著一道，《空谷山丹》占据了末松谦澄翻译业绩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在第1卷的《凡例》中，末松谦澄曾有如下记述：

此书原名为《多拉·索恩》（*Dora Thorne*），最初作为一部连载小说发表于伦敦发行的一家小说杂志新刊上，其后

^① 《试论〈空谷山丹〉——以伯莎·M. 克莱的原作为蓝本》，第113页。

^② 第1卷于1888年2月出版，注明“末松谦澄·三官熊二郎合译”；第2卷于同年12月出版，其后译者署名为“末松谦澄”一人独立翻译；第3卷于1889年12月出版；第4卷于1890年9月出版。

相继在伦敦和纽约两地作为一部单行本小说出版。我本人从前在伦敦曾经读过，不由得感叹其构思之巧妙。

也就是说，末松谦澄在留学期间（末松谦澄在英国留学期间为1878~1886年）曾偶然与这部小说邂逅，却对冠名为作者的布莱姆和克莱二人皆无所知。《再版例言》（1888年11月）里，曾写道：“作为此书蓝本的英国版本中没有注明作者，而在美国版本中注明作者为‘伯莎·M. 克莱’，可知是出自女性之手笔。初版时忘记说明此事，现补记上。”由此可见末松谦澄连作者是女性这一事实都不知道。

关于末松谦澄的译文，有关评论文章曾指出：“可以说是相当自由随便的译文，特别是叙述部分的省略相当醒目”^①，然而，考虑到当时多数的翻译作品多半都是相当任意改编的这一事实，我们是否可以说末松谦澄的翻译是比较忠实于原文的呢？堀启子女士曾这样给予评价：“姑且不论详细的异同之处，原作的宗旨基本上没有被改变。各章的段落也严格地与原作保持了一致。”^②对此评价，笔者表示赞同。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小说人物的名字被改成了日本式人名。这是出于末松谦澄的下述苦心：“若按照原文发音来翻译人名的话，那么，从头到尾阅读时总觉得有许多地方难以投入感情去体会，因此，译者不顾坊间自然会生出的异议，断然将人名改写成了和原文发音相近或者和原文意思相同的日本式名字”（第1卷《凡例》）。在此，笔者将主要人物的名字与原作对照着列举一下：

《多拉·索恩》

《空谷山丹》

罗纳德·埃尔（Ronald Earle） 有洲成人（日文读音为“ArisuNaruto”）

① 昭和女子大学近代文学研究室：《近代文学研究丛书》第20卷，1983年7月，改订增补版，《末松谦澄》，第44页。

② 《试论〈空谷山丹〉——以伯莎·M. 克莱的原作为蓝本》，第111页。

多拉·索恩 (Dora Thorne)	虎 (日文读音为“Tota”)
瓦伦丁 (Valentine)	春枝 (日文读音为“Harue”)
贝阿特丽丝 (Beatrice)	绿 (日文读音为“Hidori”)
莉莲 (Lillian)	琉璃 (日文读音为“Ruri”)
休 (Hugh)	樋口半藏 (日文读音为“Higuchi Hanzou”)
艾尔利伯爵 (Lord Airlie)	入江伯 (日文读音为“Irie Haku”)
莱昂纳尔 (Lionel)	手繰亮三 (日文读音为“Teguri Ryozou”)

其中，关于将“多拉”改译成“虎”一点，曾有文章这样批评过：“把一个凶猛无比的野兽的名字冠于一名娇柔纤弱、畏风惧雨的温婉的女子身上，无法不让读者有南辕北辙毫不相称之感。”^①

关于文体，末松谦澄曾有过如下说明（第1卷《凡例》）：

关于翻译文体，除了使用已经成为普通话的词语之外，译者还着意努力避免使用汉文古典文辞，尽可能运用一种不涉古雅、不落鄙俗的通俗文体。这亦是译者最感棘手的一项工作，而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读者不仅在阅读时可以一目了然，而且在听人朗读时也能容易理解。

这也是被评价为“无论用词还是文体皆平实易懂，并且避免了汉文直译文体，这一点在我国文章发展史上亦应引起瞩目”^②的理由所在吧。

这部小说也是当时的皇后最爱读的一本书，这一史实（登载于第2

① 由高桥五郎执笔的《空谷山丹》评论，刊载于《国民之友》第18号，1888年3月，第31页。

② 《近代文学研究丛书》第20卷，第43~44页。

卷卷首的侍从藤波子爵致谦澄的书简以及登载于第4卷卷首的谦澄致皇后宫太夫香川敬三的书简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也在客观上提高了该书的权威性地位。从结果上讲,《空谷山丹》是作为“劝诫良家子女的最好读物”^①或者“对走向社会采取消极态度的贤妻良母们的一个奖励”^②而为当时的读者阅读接受的。

三、菊池幽芳的《乳姊妹》

菊池幽芳(1870~1947)的翻案小说《乳姊妹》于1903年8月24日至12月26日连载于《大阪每日新闻》,单行本上集于1904年1月、下集于同年4月由春阳堂出版社出版。据称,这部作品使菊池幽芳“获得了远远超过此前发表的作品《己之罪》之上的好评,由此巩固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③。

在单行本上集的《前言》里,幽芳作了如下说明:

在我阅读过的各种外国小说中,名叫伯莎·克莱的女子所写的短篇作品中,有一篇故事情节颇有意思,读后不由得在脑海里浮现出了这样的想法——如果要写能够代替评书那一类的作品的话,那么,可以以这篇小说的构思为基础,再稍微加一些复杂的情节,这样一定会成功。说起来这就是我提笔创作《乳姊妹》的契机。因此,这篇小说还全有赖于克莱女士的启发。

① 《近代文学研究丛书》第20卷,第42页。

② 《试论〈空谷山丹〉——以伯莎·M.克莱的原作为蓝本》,第110页。

③ 昭和女子大学近代文学研究室:《近代文学研究丛书》第61卷,1988年10月,《菊池幽芳》,第420页。